

慕德平先生感言

慕德平：

主席同志、陈翰笙同志、同志们、朋友们：

首先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代表路易·艾黎讲话，他目前正在生病住院了。我们大家都预祝他早日恢复健康。

六十年前从今天，陈翰笙教授，开始在北大教书。因此我们今天是在庆祝中国最杰出、一个革命知识分子，卓有成绩的白布高要创建性代表中国知识分子活动六十周年。

陈翰笙同志是一个活跃的革命知识分子，他的活动遍及三大洲（欧洲、亚洲、美洲）和五个国家（中国、日本、苏联、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），在所有这些大洲和他所活动的国家中，他从未停止将革命活动和智力活动结合起来，从未停止将热切的爱国主义和典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结合起来。从未停止过，在学术上进行创新以及同时坚持做一个坚定的、有原则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。

在这些年线里他曾毫不懈怠地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奋斗，从职业生涯一开始，他不面临任何阻力，始终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而努力。当然那也不必多说，他现在还在这场斗争的最前列。我们祝愿他在青春年长的年代里继续为我们作出光辉的表率。

陈翰笙博士出版了许多卓有见识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农业著作。我最初看的是他的两部著作是《广东农业

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》《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》这两部都是经典著作，而且具有权威性，当然还有许多人知之欲速，以及组织了许多有权威的讲座，著有《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》，这部著作是在卅年代出版的。后来他的这部著作由纽约的“太平洋关系学会”出版，这部著作的出版，在政治上和科学上都是重要的事迹，因此完全奠定了卜内巴克的《中国的土地使用问题》所提出的对中国农业关系和正统治农阶层的分析。

我第一次在香港见到陈翰笙同志，是已去世的孙毓豪的朋友冀朝鼎同志介绍的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中国人也是同样认为很幸运，中国有这样两位杰出的革命家参加我们之间的活动，时间是在30—40年代。现在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，他是那么风趣幽默，告诉我国民党实行的实物土地税。在1941年以前，他的活动是从他的朋友处得知的。当时我已知道在朋友和学生中陈翰笙同志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，在战争他认识了李大钊，在上海认识了鲁迅，是宋庆龄的一位忠实同事，不仅如此，他在日本、印度、苏联和美国，有数不胜数的朋友。

在香港，我在《远东评论》上看到他十分权威的一篇文章，分析了中国当时政治情况。他当时是《远东通讯》主要编辑和主要撰稿人。在香港又是工会主要组织者活动者。

我后来第一次见到他，是1944年初在桂林，他刚从日本占领的香港化装成一个商人逃出来。后来又听说他去印度了。正好1944年进行了蒋介石的逮捕，正好是1935年由史沫特莱和路易·艾黎帮助他逃离上海一样。

在印度逗留期间，他勤奋学习，研究印度的土地关系问题，写了一本小册子，当时发表。十五年后他从比尼·拜那里知道在印度收集有关南里印度区域很多经济材料，尽管在20年前已经完稿，但是直到1980年才出版。

过了六年在英国剑桥升任后又见面了，当时中国刚解放，他正准备回国，我让他参观剑桥圣三一学院(Trinity College)牛顿居住的房间，这时他用他特有的直率告诉我，牛顿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，这确实以，牛顿不仅是一位英国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，也是一位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，他曾积极支持1688年资产阶级革命，而且1689年国会的成员，还是一个秘密的宗教异端传播者。陈翰笙回国后，参加成立出版《中国建设》月刊的活动。

我第一次访问新中国是1957年，而且有幸和陈翰笙同志共事，经常见面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。文革开始，他失踪了，对于一位这么坦率陈述意见的人，现在还是这样一个人，在文革期间失踪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。在1973年或1974年初，不仅见到他，以后我们经常互访，即使在1976年的4月一直到四人帮倒台的事，这段艰难时期，他毫不畏惧给我们住家和平安宁打电话，我和我的妻子由于他的勇气和对我们的善意深深感动。

作为一个学者、教师和教育创见的思想家，陈翰笙才气横溢，博大精深，思维清晰，具有说服力。

作为一个活动家，他勇敢、多才多艺、审慎，而且坚定不移而又灵活。

作为一个老师，他热情坦率而勇敢，有人说他简直达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。他不乞求重价，而且从不甘心接受吝啬鬼的酬劳。同时他非常耐心地愿意将他的时间给予一个学生，不管初学者还是学识渊博、高深的人，给他他自己的时间，只要这些学生是诚心诚意想学习的。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碍他无私地将自己贡献给他的工作和他的学生。

陈翰笙很幸运，他有一位贤内助，她在非常疼痛的很困难的1968年去世了。我们幸运陈翰笙有一个忠于他的家庭，我们大家都很幸运有他作为我们的教师、同志和朋友。我们的英国祝愿你今天许多许多年的创造性的活动。你已经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，我们深信今后你将作出更多的贡献。